

第四章 《慈禧全傳》揭櫫的歷史法則及所反映的政壇現象

歷史小說家如果但求敷衍故事、勾串人物而以為能，卻未能在作品中表現其獨特的歷史觀察心得和文化認識，那麼他最多是個「說書人」而已。構成一部小說乃至歷史小說的最可貴價值，便在其狀述史事、臧否人物之際，能否讓細心的讀者，解讀出敘事背後所欲傳達的歷史觀。筆者以為要探討《慈禧全傳》背後的思想及主題，應扣緊在高陽揭櫫了什麼樣的歷史法則？有無獨特性或侷限性？以及他在描寫晚清最後五十年間，觀察到當時政壇那些特殊的現象？

高陽窮其半生精力，寫下眾多的歷史小說，又有意識的架構起全清史小說，加之高陽有不少關於歷史和考證的專論文章，是故他在寫作歷史小說之際，很少只單純表現在史事的推行、人物的營造，或者力求情節的繁複、扣人心弦等方面而已。他經常將考證研究的心得置入小說創作中，以表現他不同於學院派的歷史觀察和體會。因此，高陽究竟是以何種歷史法則看待晚清最後的五十年，以及他從這五十年裡又觀察到那些現象，這兩點便是構成《慈禧全傳》最重要的主題及核心題材。本章即就高陽揭櫫的「歷史法則」，及其所觀察到的「晚清政壇的亂象」作深入探討。

凡論及高陽對歷史研究的心得者，一定會提到「中心勢力說」。¹高陽最早提出此說是為了研究紅學，他認為要破解《紅樓夢》的若干不可說、不便說的隱義諱語，必須從「八旗制度」入手，因為那是當時的「中心勢力」：

我們要了解一個作者，必須了解這個時代的中心勢力，要了解一個作者，必須了解他的身世背景。尤其是他在這個中心勢力中，受中心勢力的支配到什麼樣的程度，為什麼研究曹雪芹要研究八旗制度，而研究其他作者不必，其原因也即在此。他既生活在中心勢力的籠罩之下，我們即必須深入了解這個足以影響或支配其思想、情感的中心勢力，這是個本，本應先予掌握。²

高陽寫作紅曹系列的小說乃至專論，是抓住「中心勢力」的關竅——八旗制度，而其研究清史更是秉此原則立論：

¹ 高若蘭：《高陽歷史小說（胡雪巖三部曲）研究》（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7年），頁188—190。陳蕙如：《高陽清代歷史小說研究》（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0年），頁110—116。

² 龔鵬程：《歷史中的一盞燈——訪高陽談歷史小說》，收錄於《歷史中的一盞燈》（臺北：漢光文化事業，1984年1月），頁30。

瞭解政治上的中心勢力，看支配政治的是知識分子、貴族、外戚、宦官，還是藩鎮？大致知識分子掌權，常為昇平之世；藩鎮跋扈，則每成割據的局面，地方有幸有不幸；貴族干政，應視所結合的勢力為何，結合知識份子，便有清明之象；結合外戚宦官，必致宮廷多故。最壞的是以閹人而操國柄，為蒼生之大不幸。³

高陽另一個歷史法則研究心得是「氣數說」，關於這點前人論及高陽的作品幾乎未曾提及。其實關於「氣數」、「天意」的看法，和「中心勢力說」基本上是背道而馳的，此係「氣數」、「天意」乃抽象難以驗證的，而「中心勢力」則相對具體可供檢查。這對於為文重考證的高陽來說，竟然將兩種極端的觀點並置在一起立論，不能不說是一大異數？高陽在《清朝的皇帝》這部屬於專論型的著作中，至少出現六次以上關於「氣數」或「天意」的觀點，而在《慈禧全傳》中更出現高達三十二次這類的敘述語或題材，這顯示「氣數說」並非高陽偶然出現的歷史喟嘆，它很可能已形成高陽研究歷史法則的觀點，所以筆者將對此提出討論。

正因為晚清最後五十年的氣數衰敗，使得皇權無法有效被利用，並藉此羈縻知識份子，造成「中心勢力」全為以知識份子為主的派系鬥爭所籠罩。這反映在政壇上，便是許多官員為求生存乃至榮華富貴，而衍生許多的荒唐現象，並由此造成官場的貪腐橫行、庸懦成風。清朝自道光年間的鴉片戰爭開始，歷經兩次英法聯軍、太平天國之亂、辛酉政變、捻亂、回亂、中俄新疆邊界之爭等等內憂外患，不但疲態盡露，許多自乾、嘉甚至更早時代即潛伏的問題，譬如賣官鬻爵、貪污納賄、南北之爭、滿漢排擠等現象，更趁此之際全面迸發。這使得好不容易營造出的「同光中興」氣象，竟成往後漫漫長夜的短暫璀璨；光緒甲申之後，所有的怪現象、惡勢力都向慈禧一人集結，形成以慈禧太后為端點的貪污納賄、腐敗無能的共犯金字塔結構。所以本章第二節將討論《慈禧全傳》裡「晚清政壇的亂象」，重點就擺在為官之道和官場的腐敗現象作討論。

³ 高陽：《清朝的皇帝（二）》（臺北：遠景出版社，1988年12月初版），頁1424。

第一節 《慈禧全傳》揭櫫的歷史法則

一、中心勢力說

中國封建社會很受宗法血緣關係的影響，上自統治階層的宮廷、官僚體系，下自平民百姓幾乎都是藉由宗法血緣的關係，將人給組織凝聚在一起。正因為內聚力強，所以帶有強烈的自閉性，這種情形會隨著中國愈到後世大一統的力量愈強，其自我封閉性、停滯性也相應愈甚。而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宗法組織，為何與國家組織不但不相矛盾，反而竟互相結合起來呢？原因在於它有一個關鍵性的調節機制：儒家學說。早在春秋時代，儒家就提出了協調宗法組織和國家社會組織的理論，孔子學說中的「仁」是最高的道德原則，它是聯繫宗法組織和國家組織的橋樑。在宗法血緣關係的社會組織制度中，對家長的「孝」是首要的，它是「為仁之本」。⁴儒家學說將這種宗法組織的道德要素推廣到社會組織中去，要求臣對君的「忠」，以及「君」實行「徠遠人」的「仁政」。「仁」又是有差等的，必須符合「禮」。這樣一來，宗法關係就不僅是維繫某一血緣集團的組織力量，而且不再是自閉性的，因為它被推廣成為一種社會組織的普遍原則了。

本來，如果僅僅是儒家學說把宗法組織與國家組織協調起來，將國家看作是家庭的同構，那麼它只是一種觀念的力量。但是，一旦用儒家學說來組織國家，並通過儒生來實行國家管理，那麼這種觀念的力量就會轉化為組織的力量，成為協調宗法組織與國家組織的調節器。也就是說，利用儒生為主幹來組織國家官僚體系，實現一體化的結構，再搭配宗法組織的力量，如此便能在一個封建大國中順暢的推行：信奉孔孟聖賢學說的封建儒生，一方面推行儒家學說，維護國家統一，一方面又用孔孟倫理來管理家庭，使自己的行為成為整個社會的規範。這種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觀念合一的一體化結構，就像粘合劑一樣，使宗法組織與國家組織協調起來了。而以知識份子為組成主體的士大夫階層，多依循源遠流長的文化價值傳統（即倫理綱常）來參與國家政事，並在實踐過程中試圖教育君王或改造君王。因此，所謂的封建君權專制，有相當一部分內涵是摻雜了古代知識份子共同建立的文化專制。

⁴ 《論語·學而》：「有子曰：『其為人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鮮矣！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？』」收錄於由朱熹、蔣伯潛譯註的《四書讀本》（臺北：啟明書局，出版年不詳），頁2。

而為了自身的存在和既得的利益，統治階級總是竭盡自身的一切能力，來保持固有的社會結構。宗法一體化結構確立以後，無論在官僚機構內部還是之外，通常都會有一套企圖遏制其膨脹和腐化的機制，這套機制最重要的就是皇帝的調節作用，這一作用會隨著中央的更加集權而不斷強化。而皇帝的調節作用是和何進行的呢？首先我們要了解，官僚機構的中堅份子為儒臣，他們散佈在中央及地方各級官僚；其下是辦事機構和人數眾多的吏員。官僚機構的最後控制者便是皇帝，但是別忘了皇帝還帶來兩個旁支系統：皇室貴族和宦官。皇室貴族包括了皇室宗族和外戚，宦官是內廷服務人員。這兩部分人原本並不是一體化的國家機器的職能部分，但由於他們是與皇帝關係最密切的人，所以他們往往也能干預、參與國家大政。

皇帝的調節力主要有兩個方面：一是維持官僚機構的統一性和流動性；二是遏制官僚機構的腐化。皇帝的這兩種職能，是克服官僚機構門閥貴族化，保持其調節作用的必要機制。中國封建官僚機構的統一性和流動性，是依靠一整套選拔制度以及中央對官僚的調配、任免來實行的。如果選拔和考核儒生、任免官員完全由官僚機構內部的有關部門來完成的話，那就很容易形成固化的權力中心。而傳統的中國是小農經濟的社會，當官僚機構一旦失去流動性，使得官僚的選拔成為表面手續的話，各級官僚就會傾向門閥化，演變為世襲貴族所壟斷的現象。為了預防此種弊端的發生，必須有一種外在的、凌駕於官僚機構之上的權力，來維繫官僚機構的統一性和流動性。

皇權正是這樣一種權力。歷史上有為的皇帝大都充分意識到和實行此一調節力，他們任用賢相和有識之士，常常把一些資歷甚淺而有抱負的官員提拔到高位上，使官員常處於循環流動和競爭狀態之中。問題是皇權之上無人可管，是故多數的皇帝往往成為腐敗的核心。

《慈禧全傳》的時代背景已是咸豐晚年、經同治而光緒，幾乎全由慈禧太后主宰朝政幾達五十年。這近半世紀的期間，清朝飽經內憂外患，早非康、雍、乾三帝時的盛世：皇權（即慈禧太后）已無法有效裁抑臣工結黨營私，甚至慈禧中後期也加入貪污享樂的行列，故而原本可作為良性競爭的政壇「南北之爭」，遂成為利益的「南北之爭」，那一派奪得主導權便可以享盡權與錢，而落敗的一方則想盡辦法和「清流」合作打擊政敵，而在惡鬥的過程中，幾乎不見皇權的介入調和鼎鼐。

究其因除了慈禧太后本身才智極有限，本不足以主導政局外，更重要的是她在「辛酉政變」過程中驚嚇太過，一旦「女主當國」後和恭親王的合作蜜月期一結束，即懷疑恭親王是下一個肅順而亟欲拔除。爾後的醇親王、榮祿和奕劻，因為有恭親王的「前車之鑑」，故而事事仰承慈意，基本上只是她勢力的延伸而已。更重要的是從恭親王開始到奕劻這四位軍機首輔，也全都程度不一的捲入「南北之爭」，如此惡性循環的結果，整部《慈禧全傳》就圍繞在「慈禧太后和恭親王之爭」、「南北之爭」和「袁世凱與瞿鴻禨之爭」的政治惡鬥局面。故本節「中心勢力說」即針對上述三個政局的演變過程，一一的深入討論。

甲、慈禧太后和恭親王之爭

恭親王在「辛酉政變」中居功厥偉，兩宮太后為了感謝他封其為「議政王」、「軍機首輔」、「領親王雙俸」及「親王爵世襲罔替」，並且慈禧太后為了更加籠絡他，而封其長女為「固倫公主」（後恭親王政壇受挫，深覺器滿易盈為人所忌，故而主動提出撤銷「固倫」之名號，兩宮同意改封「榮壽公主」），恭親王當此之際可謂權傾朝野達於顛峰。而一旦與兩宮（其實便是西宮）的政治蜜月期一過，隨之而來如潮水般的現實問題，將迫使他與西宮不得不正面对交鋒。然而，慈禧太后才智有限卻又權慾無限，恭親王雖是當時皇室中富有才智者，惜閱歷不足不知動心忍性卻又挾功任性，漸漸讓慈禧太后感覺到恭親王既不尊敬她且又多方限制其權柄，因此又激起她的好鬥之心。此外，又有安德海結合一班不得勢的八旗將領、翰林等，挾筆刀上奏批評恭親王「貪墨、驕盈、攬權、循私」，以上種種主客觀因素交織揉雜，促使慈禧太后和恭親王展開慈禧垂簾聽政後第一場「中心勢力」的惡鬥。

雙方引爆點開始於《玉座珠簾》，恭王自主掌內務府後，即擢節宮廷的各項用度，此係幾經內亂外患後國庫空虛，故不得不然。而性好奢華的慈禧太后，忍得了一時節省，忍不了長期的儉樸，加之不只一次聽安德海報告，說長春宮每每向內務府要東西，恭王難得有痛快撥付的時候。她雖也知道，恭王不是肅順，並非有意跟她為難；但是，他也並不見得如何尊

崇太后。⁵此後慈禧為了滿足在物質上的慾望，雙方的衝突日益擴大，也激起慈禧一鬥這位曾經讓她短暫傾心的天潢貴胄，開始在小地方上逐步修理恭親王：

第二件是恭親王的摺子，請重定朝會的班次。他以「議政王」的身份，一直居於王公大臣的首位，現在自請列班在惇王之次。……慈安太后想了想說，「我看交議的好。」「不然。」慈禧太后搖著頭，「本來是件小事，一交議變成小題大作，倒像他們手足不和、明爭暗鬥似的。多不合適啊！」……說服了這位老實的「姐姐」，慈禧太后感到小小的報復的快感。這幾年她深切瞭解，做官的人，對國計民生或者不甚措意，但於權貴的榮辱得失則十分敏感；恭王的「聖眷」，一直甚隆，凡有恩典，他自然亦總以「謙抑為懷」，辭親王世襲，襲親王雙俸，不管到最後的結果如何，一開始總是「優詔褒答」。所以這個朝會班次自請退居惇王之後的奏摺，如果依然給他面子，至少應該「交議」，暗示出不以為「五爺」的地位應在「六爺」以上的意思；而現在一請就准，少不得會有人猜疑，恭王的聖眷不如從前了。⁶

恭王當然也不是省油的燈，看出慈禧許多小動作背後的含義，由於自負且年輕氣盛，他也在小地方上予以反擊。他利用平定太平天國之後分封之事，將早已擬好的名單遞上。慈禧一看名單內容是：「江西巡撫沈葆楨，一等輕車都尉，世職，並賞給頭品頂戴；署浙江提督鮑超，一等子爵；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左宗棠，一等伯爵；浙江布政使蔣益澧，騎都尉世職。」慈禧邊唸名單邊想：「恭王原已有了安排，如何又說『請旨辦理』？這不是明顯著殿廷奏對，不過虛應故事？什麼恩出自上，都是騙人的話！之後，慈禧很發了一場脾氣，軍機大臣第一次感受到太后的『天威』，但唯有恭王不同，他有的只是『反感』」。

在雙方明爭暗鬥的過程中，高陽藉由一事讓兩人開始出現高下：恭王依舊一派天真、自以為是；而慈禧則在批閱奏摺的過程中，淬煉出對人和局面有一定的眼光和謀略。事情是發生在太平天國初定而又有捻亂須救平的問題上，恭王在軍機處力排眾議，主張「讓曾滌生以欽差大臣，駐紮顎皖邊境，剿辦捻匪；李少荃暫署兩江，不必兼江蘇巡撫；而江蘇巡撫之

⁵ 高陽：《玉座珠簾》（臺北：皇冠出版社，1999年2月十九刷），頁17。

⁶ 同註5，頁35—36。

⁷ 同註5，頁39—40。

缺則留給曾對慈禧一家有恩的吳棠。」恭王自覺如此調度是面面俱到，所以愈發在御案侃侃而談，意氣發舒得意非凡。然而慈禧卻大不以為然：

慈禧太后與他的態度，正好相反；表面彷彿默許，心中不以為然。這三年來她把曾國藩的奏摺看得多了，字裡行間，另有一番認識；曾國藩這個人最謹慎，總記著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」這句話，功名太盛，唯恐遭忌，金陵克復，推官文領銜會奏，就可以看出他的戒慎恐懼之心。目前又亟亟乎裁遣湘軍，為曾國荃奏請開缺回籍養病，處處顯出急流勇退的決心；然則讓他到安徽、湖北邊境去坐鎮，使得僧格林沁在面子上很難看，他肯嗎？他是不肯的。……這話她不願說破，說破了讓恭王學個乖——哼！她在心裡冷笑；恭王自以為本事大得很，讓他去碰兩個釘子，殺殺他的氣燄也好！……⁸

高陽透過這段引文，意在表達一個非常嚴重的政爭問題：捻匪四處流竄，軍情如撲火務求迅速反應才是，可是卻不見慈禧為社稷謀，寧可不說破也要讓恭王出醜學乖。必待曾國藩三番四次請辭、僧格林沁發脾氣，才讓恭王了悟當初設想未免太天真。一旦再重新佈局，則捻匪卻已從癩疥之疾轉而為心腹大患了。慈禧垂簾初期的「中心勢力」，主要就是在和恭王明爭暗鬥的惡性循環中度過。高陽作此安排，正顯示慈禧夠不上一「明君」的資格，她只是在私利、物慾上專斷獨行，而未能在大局上當機立斷。歷史給予慈禧一個十分惡劣的內外環境，正是考驗主政者能否力挽狂瀾之時，而她卻錯失此良機，窮其一生不斷在鬥、在爭，將當時皇室成員中堪稱最優秀的恭王給鬥的銳氣漸失。

恭王的銳氣漸失、處事拖泥帶水，就表現在「誅除勝保」一事上。由於恭王感念勝保辛酉年勒兵京畿，箝制肅順。而勝保那一支雜湊的軍隊，到底能予肅順多少威脅固然難言，但是卻因為勝保的積極勤王，使恭王的信心倍增；同時也因為有勝保的軍隊可資運用，使一些原來徘徊在肅順和他之間的人，頗有倒向自己這一面。得失成敗，寸心自知。恭王始終覺得於勝保有虧欠，因此為這公與私的雙重因素，使得一向果斷明快的恭王，卻顯得猶豫不決。慈禧太后的表現倒是明快而顯得有為有守，她不談勝保之事，而先拿何桂清的案例作譬喻。何桂清喪師失地，當時恭王主張嚴辦，而慈禧則以為只要

「革職永不敘用」也夠警惕大家了，不過由於恭王力主若非嚴辦，則無法整飭綱紀，因此最後慈禧也只好接受恭王的意見。接著，她收拾起閒話家常的語氣說道：

我也是由何桂清這件案子，想到勝保。封疆大吏，守土有責，不能與城共存亡，說是為了整飭綱紀，辦他的死罪；話是沒錯，可是人家何桂清到底不過一個文弱唸書人，聽見長毛來了，嚇得發抖，也不算是件怪事。倒是勝保——如今什麼年頭兒？他還在學年羹堯，把朝廷當作甚麼看了，這不是怪事嗎？這也不去提它；我就有一句話，忍不住要說，甚麼叫紀綱？殺何桂清就有紀綱，辦勝保就不提紀綱了？這就是不公，不能叫人心服，也對不起自己的良心。⁹

高陽巧為佈局，讓慈禧以恭王之矛攻其之盾，讓恭王碰了這麼一個大釘子，不但於顏面有損，也讓有心人看出他的聖眷正嚴重滑落。此後在慈禧面前不再再難暢所欲言，反恭王的勢力也悄悄在集結伺機反撲。有御史蔡壽祺者，上摺言恭王「貪墨、驕盈、攬權、徇私」，恭王不服和兩宮辯詰態度強硬，激起慈禧決意給恭王以致命一擊，便是培養易於控制的醇親王——他早已躍躍欲試，並且其福晉又是慈禧的親妹子。恭王經此事件之後，信心全失、氣勢為奪，再也無法有太大的作為，此後在軍機處再不見英姿颯爽、行事明快，唯仰承慈意、不求有過而已。

乙、南北之爭

自安德海一案後，慈禧懍於在宮中亦為孤立，所以一方面韜光養晦；一方面培植醇王，以作為對抗恭王的工具。然而醇王志大而才疏，亟謀有以自見，但是他在政務上既無從插手，於洋務亦昧然無知也不願意知。在此情勢之下，醇王若想求發展，只有從兩條途徑下手，一條是結納八旗武將世家，一條是集合保守分子。當時八旗武將世家，多有追懷祖宗勳業者，然心妒湘淮兩軍功績卓著，其中頗有昌言如何恢復八旗勁旅之雄風者，因此醇王順勢附和，進而建言，遂為此派奉為領袖；而「恢復」之始便是整頓神機營；及至僧格林沁陣亡，其舊部亦多接近醇王。僧王之子伯彥納謨謁便多方和醇王交

密，後結為兒女親家。至於集合保守分子，則以支持保守派領袖倭仁為主要手段，而倭仁一生的志業，則是反對「西藝」並且「仇教」。

大約與此同時，朝中漢人也漸漸形成兩派，北派魁首為李鴻藻，南派盟主為沈桂芬。當恭王和文祥領導軍機之時，基本上秉持肅順「用人唯才」「重用漢人」的原則，所以並未有明顯的派系問題；但和恭王私交甚篤的寶璽，在政治上較傾向於沈桂芬的南派，而重點是恭王和文祥的政治主張也與南派相近。所以，當時沈桂芬掌樞筆，勢力還在北派李鴻藻之上。帝師翁同龢因籍貫當然亦屬於南派，但因授讀光緒之故，而為帝父醇王極力拉攏，其中牽線者則為榮祿。關於沈桂芬的權勢，在《玉座珠簾》中，高陽藉由彭玉麟的觀察，陳述分析了沈桂芬表面上的權勢雖不甚大，然其內容卻極為驚人。原來彭玉麟來京覲見同治帝途經天津時，已先從李鴻章口中，得知朝中派系的梗概。既至京城稍經接觸、揣摩，他得到一個結論：

兩位漢軍機大臣，已成南北對峙，各張一幟的形勢。看起來是李鴻藻的聲勢來得壯，以帝師而提倡「正學」，尤其是在倭仁死後，徐桐雖想接他的衣鉢，無奈「太上感應篇」比起程朱的「太極圖說」，究竟不可同日而語，所以衛道之士，直諫之臣，隱隱然奉李鴻藻為宗主。但是，這可以鞏固他的地位，卻不能增加他的權力。

李鴻藻得的是虛名；實權遠比不上沈桂芬。沈桂芬出於文祥所荐，而文祥政通人和，不但受兩宮太后的信任和恭王的倚重，並且外而督撫將軍，內而部院大臣，無不對他尊敬。沈桂芬有此奧援，加以在總理衙門支持寶璽，迴護董恂，十分盡心，因此，除了洋務以外，像寶璽專管財政那樣，綜攬軍務亦幾乎成了沈桂芬的專責。¹⁰

「南北之爭」是光緒帝初期政壇的「中心勢力」，兩派可謂是無所不爭，大喪國家元氣。即以對俄是戰是和為例便可知梗概：同治十年，新疆回亂，俄國趁機由西伯利亞派兵佔領伊犁。總理衙門照會俄國，質問侵入的理由？俄國政府答得冠冕堂皇，說是代為收復伊犁，只要中國政府的號令一旦能行於伊犁，自然退還。到了光緒四年，天山南北路都已平安，總

理衙門當然要素回伊犁。然俄國政府提出兩個無理條件：中國政府要能夠保護將來國境的安全，同時償還俄國歷年耗於伊犁的費用，如此一來必須派員交涉。交涉者為沈桂芬的愛將崇厚，但他卻簽下喪權辱國的條約，北派乃至清流無不憤慨而力主一戰，不但不承認崇厚所簽訂的條約，並且要求誅崇厚以謝天下，因此朝廷為了與俄是戰是和而又起「南北之爭」。

恭王有鑑國庫空虛又正在自強建軍，多方衡量實不宜戰；而北派結合清流不斷上疏積極求戰，慈禧則因左宗棠平定回疆，信心大增而覺得不妨一戰，所以立場和北派頗相一致。然而和戰是基於國家整體力量、利害的角度考量，以致兩派廷辯爭論，不但不可憂反而大為可喜。然而兩派之爭全是各自利益考量：沈桂芬是崇厚的薦主，就算不能力保他不死，也不能失去主和的立場，恭王當然是站在沈的這一邊；北派除了因崇厚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於國有損外，更可藉此天賜良機拉下南派、拉下恭王。整個朝廷亂哄哄莫衷一是，慈禧太后當然也是拿不定主意。

此事最後是南派稍占上風，另簡曾紀澤出使重新議約，算是平息了一場南北爭議。沈桂芬在政治方面固然略居上風，但另一方面卻不比榮祿有醇王及太監李蓮英這兩具「上天梯」可通瑤池。沈、榮交惡，起因於穆宗崩逝，迎立光緒；草詔本因由文祥動樞筆，然文祥因病不能成篇，榮祿倉卒之間卻忘了身分不知避嫌，竟擅動樞筆起草詔。此舉惹惱了向來以氣量狹隘聞名的沈桂芬，因而大為不悅，兩人勢成水火。¹此後榮祿和李鴻藻聯手報復沈桂芬，說動慈禧將堂堂一品軍機大臣外放疆臣之尾的三品貴州巡撫，政壇為之嘩然。^{1 2}

光緒六年除夕，沈桂芬病歿，北派借中俄界址糾紛一事，乘機興風作浪，得占上風。此後兩派互為雄長達二十年之久，其間每遇大憂患，輒為兩派資作博局，大展身手之機。慈禧頗為厭苦，遂重用親貴及滿洲家臣。清朝之亡，南北黨爭難辭其咎。

丙、袁世凱與瞿鴻禨之爭

¹ 同註 5，頁 1068—1069。

² 高陽：《清宮外史》（臺北：皇冠出版社，2004年5月初版二十刷），頁 10。

筆者在後文第五章第一節「敘事時間」裡提到《母子君臣》和《胭脂井》之間，不見光緒十七年到二十三年底的敘事，當《胭脂井》一開始時，已是「戊戌變法」失敗之時。「戊戌變法」之後，榮祿與袁世凱漸漸結合，這決定了愛新覺羅皇朝終將亡於慈禧太后之手的命運。自李鴻章垮台至戊戌政變期間，為帝黨壁壘分明，公然反抗后黨的時期，就表面上來看，乾綱大振，一切大政均出自宸斷；而翁同龢重用張蔭桓，一隻手洋務、一隻手財權，似乎得意非凡。但后黨以榮祿為首，卻在暗中佈置，主要的策略，即是接收李鴻章始終不甘放棄的北洋兵權。而為防翁同龢的猜忌，以南派資深的王文韶為直隸總督以作掩護；暗中則重用袁世凱，另建新的武力。同時慫恿李鴻章，在洋務方面，處處跟翁同龢為難。而最厲害的一招是，在恭王身上下工夫，掣翁同龢之肘。至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廿七日，翁同龢終於被逐回籍。這天正好是翁同龢六十七歲生日，三朝老臣、兩代帝師，竟不容其一舉桃觴。這倒不是慈禧刻薄，而是恭王臨終之時，皇帝奉太后之命親臨視疾恭王所作的建議：

已入彌留的恭王突然張眼對皇帝說道：「聽說有廣東舉人主張變法，請皇上慎重，不可輕信小人。」這是指康有為而言。在此之前，皇帝曾打算召見康有為，面詢變法之道；恭王不肯承旨。他的理由是：定例，皇帝不得召見四品以下的官員；而康有為是工部主事，官只六品，結果是命軍機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代詢。此時又作最後的諫勸，皇帝含淚領首，表示接納。而亦因此，為慈禧太后所惡，逐出軍機，閒廢十年而復起的恭王，身後恤典優隆，賜親貴最高的諡號為「忠」；輟朝五日，素服十五日；入祀賢良祠，配享太廟。¹³

自甲午戰敗至李鴻章之死，七年之間，清朝元氣大喪；加之拳匪之亂，兩宮倉皇西奔蒙塵，整個朝廷益顯人才凋零。而在擾攘翻騰之中，所造就者得一文一武兩人，文為瞿鴻禨、武則為袁世凱。此後清朝僅餘數年的祚命，幾乎全籠罩在兩人的爭鬥漩渦中。兩人的樑子結在八國聯軍之禍後兩宮回鑾的路上，原來慈禧太后和光緒所御的花車，是由督辦鐵路的盛宣懷所預備，其餘大批扈從人員約兩百節車廂，則歸袁世凱調撥備辦。袁世凱的辦事能力極強，差事自然是妥當齊全。壞就壞在他一時失察，竟擅侵外務部尚書瞿鴻禨之權，派唐紹儀照會各國公使，以安排如何歡迎兩宮回鑾的各項禮節活動。¹⁴

¹³ 高陽：《胭脂井》（臺北：皇冠出版社，2000年5月十五刷），頁68。
¹⁴ 同註13，頁657。

袁世凱疏忽了這點而為瞿認定是「冒功」。瞿鴻禨也是個辦事好手，但和沈桂芬一樣有個毛病，就是氣量過狹。他以袁世凱知悉此事卻不告訴外務部而直接上奏，心裡已有了疙瘩，於是伺機尋隙報仇。

袁世凱事後懊悔自己粗心而急欲修好，經和幕僚磋商後，決定在榮祿之外，更結奧援，而從各種條件、各種跡象上看，瞿鴻禨的勢力方興未艾。因此，寧委曲堂堂直隸總督之尊，欲拜在瞿鴻禨的門下。然而瞿終究給袁以一軟釘子碰，此後雙方之爭將愈演愈烈。及至榮祿下世，奕劻領樞，政以賄成，肆無忌憚，朝廷內外風氣之敗壞更不如初回鑾時。袁世凱在榮祿下世後和奕劻相結納，而瞿鴻禨則引粵督岑春煊為外援。而岑春煊雖在兩宮蒙難時勤王有功，並且妒惡如仇，然性情至為褊急，不能容人，動輒參劾屬員，當時人戲稱張之洞揮金如土，謂之「屠錢」；而岑春煊則為「屠人」，奕劻和袁世凱後來就針對岑春煊的這點個性設計修理他。

瞿鴻禨這邊也積極和反袁的親貴合作，以「改官制」之名，行削弱袁世凱權柄之實。¹⁵奕劻和袁世凱這邊心有未甘，由奕劻之子載振出面，找來了極懂得驚聲氣的朱氏父子，說動御史惲毓鼎參劾瞿鴻禨。¹⁶最後奕劻和袁世凱再對瞿鴻禨補上最致命的一刀：動用榮壽公主和奕劻之女四格格，兩人在慈禧面前一搭一唱，說瞿鴻禨剋扣慈禧萬壽用度，並且利用門生汪康年所辦的京報，私通洋人洩露朝廷機密，意欲密謀歸政予光緒。¹⁷這兩點都是慈禧的痛處，兩人一擊命中瞿鴻禨的要害，不久即被開缺回籍，瞿黨落敗，袁黨盡收其資源。

分析高陽在《慈禧全傳》中對這三次政爭的鋪陳及論點，我們發現到第一次的「慈禧與恭王的鬥爭」肇因於恭王在「辛酉政變」之後，集部份皇權和所有軍機裁量權於一身（即議政王兼軍機首輔），當恭王和慈禧於政變後的融洽合作期一過，慈禧逐漸發覺自身握有的皇權在遭侵奪後，於己大為不利：以恭王為首的軍機處決定了大多數的人事及政策方針，使慈禧的權力之手難以伸入；另外，恭王和慈安兩人隱然聯手，遏制慈禧難填之物慾。加之恭王身段不夠軟，於言語上頗和兩宮

¹⁵ 高陽：《瀛臺落日》（臺北：皇冠出版社，2004年5月初版廿三刷），頁212—215。

¹⁶ 同註15，頁284—291。

¹⁷ 同註15，頁291—294。

相頡頏，權閹安德海又在一旁挑撥是非，促使慈禧必須作一處置：削除恭王的部分皇權（撤「議政王」）和削弱其軍機裁量權。如此不但可免去恭王成為下一個肅順，自己也可真正凌駕於其上成為獨一無二。

這兩人如鬧家務的「皇權之爭」雖未動搖國本，實則是在醞釀一個影響更深遠的政治風暴——南北之爭。高陽的佈局和論點很清楚：當恭王未被削權時，雖然某種程度上侵犯了屬於同治（實則是垂簾的慈禧）的「皇權」，但他終究有能力抑制早已存在的南北兩派的惡鬥，從而表現出至少形式上的「南北既對峙又合作」的局面。如今恭王不但權力大不如前，且經此之後銳意大減、噤若寒蟬，遇事唯求無過不敢有功。恭王既然不能成為朝廷的柱石，也無力於調和鼎黨，這就讓南北兩派人物有了點燃戰火，搶奪政治版圖的機會。當南派沈桂芬掌樞之際，居下風的北派獲得清流的龐大奧援，隨時伺機找南派之縫隙奏上一本。在兩派鬥爭的過程中，高陽適時以「中法戰爭」和「伊犁條約」二事作分析，說明當朝廷面對法國侵犯越南一事，南派「倡和」，而相對弱勢的北派則「主戰」，雙方相互攻訐、推諉，眼見戰火已起而朝廷兀自「和戰未決」。好不容易代表皇權極力主戰的慈禧介入了，但她的居心並非純然為國而是摻有私心。她利用支持北派的清流全力打擊軍機，一舉拔除恭王一派，和以沈桂芬為首的「南派」，終於讓「北派」的主戰佔上風，而由慈禧的妹婿醇王掌管軍機。然而當醇王主政後，欲過河拆橋除去氣焰囂張的清流，竟拿國家安危利益為工具，派唯務空談的清流健將張佩綸等人赴前線督戰，南北之爭最終是兩敗俱傷，清流的勢力也就此瓦解，而此番鬥爭更是大傷國本。

高陽藉由「中法戰爭」的和戰未決、所用非人，和「伊犁條約」崇厚喪權辱國的議約內容這兩個事件，印證他的「中心勢力說」：王朝的興衰與否，取決於以知識份子為統治核心的「中心勢力」，是否有見識、能力和團結合作。而南北兩派是否能攜手合作，最大的關鍵力量是「皇權」的介入調處。高陽想表達的是：慈禧所代表的皇權之所以遲不介入，是因為恭王的實力雖大不如前，但仍有一定的影響力，就這點影響力讓慈禧「皇權之手」難以控制軍機處的政策。而欲控制軍機，便需將恭王一派連根拔除，中法戰爭恭王所支持的南派既然「主和」，剛好給了「主戰」的慈禧機會，支持清流以打擊南派，如此不但除掉恭王，也可一戰盡雪前恥。

降至「瞿袁之爭」時，高陽藉由情節的推衍分析到：其時已是慈禧的晚年，在歷經中國前所未有險被瓜分的「庚子事

變」後，慈禧原本極具統攝力的皇權已所剩無多，一班無知又無能的少年親貴乘機崛起，加之先前「南北之爭」時，代表輿論制衡力量的一「清流」之言已希聲，整個朝廷已難見「皇權」的介入調節，以及「清議」力量的批評和抑制，「瞿袁之爭」就在這樣的時空環境下愈演愈烈。高陽在敘述「南北之爭」時一再提到，儘管彼此鬥爭激烈，但是至少有像是「中法戰爭」、「伊犁條約」等攸關國家前途、安危的「議題之爭」，然而到了「瞿袁之爭」時，已完全不見議題和政策之爭，所爭唯權與利而已。晚清在歷經這三次愈演愈烈、愈等而下之的政爭後，內外臣工的人心已腐敗到無可救藥的地步，清朝的覆滅已是無可避免的結局。

二、氣數說

一般論及高陽史論文章或歷史小說者，多著重其「中心勢力說」觀點上，而未有注意到高陽體會到的另一個歷史法則——氣數說。研究《慈禧全傳》不能不看其《清朝的皇帝》等專論史著，筆者整理該書至少出現六次以上關於「氣數」或「天意」的論點：

甲、明亡清興，實有天意，有清太祖、太宗及代善；並有明熹宗、思宗。明朝並非無人，袁崇煥、孫承宗、熊廷弼，無不可以制滿洲，但其遭遇，真是令志士喪氣。¹⁸

乙、總之，萬曆一朝四十餘年，冤氣戾氣，凝集不結，遂有天啟東林之禍，閹黨橫行，崇禎初雖有「逆案」，但君子道消，小人道長之勢未改，幾無正人君子容身之地。此正明朝氣數已盡，崇禎既昧於天命，不能返躬修省，更不能善盡人事，惟果於殺戮，足令志士喪氣，不亡又安可得？¹⁹

丙、說起來似乎齊東野語，而確為實情，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，清太宗一部三國敗明朝。這部「三國」還不是陳壽的三國

¹⁸ 同註 3，頁 59。
¹⁹ 同註 3，頁 73。

志；而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。²⁰

丁、清朝開國以來，有三次大危機，一是多爾袞漸形不耐，即非篡位，亦將割據，引起內部大亂；二是世祖逃禪，打算傳位其堂兄康親王傑書，此則將由內亂引起明朝義師與三藩的聯合軍事行動。這兩次危機，皆由「天降白玉棺」而應變又得法，乃能弭大患於無形，真是天意。²¹

戊、文宗知人之明，遠過其父；而又信任肅順，故林則徐如不死，膺專閫之寄，可無虞掣肘，必能暢行其志，洪楊不足為患。林則徐之死，惟有歸於氣數而已。²²

己、可惜的是，愛新覺羅皇朝的命運，已將至終朝。歷史的法則是，一個皇朝之趨於衰微，往往以皇嗣不廣為其徵兆，因為第一、遷就現實，無法擇賢而立；第二、在教養上不免姑息。穆宗的情形，大致就是如此。²³

《清朝的皇帝》出現多次關於「氣數」、「天意」的觀點，絕不能視作高陽一時的歷史喟嘆，應是對歷史發展中呈現的某些不可解之因，導致不可解之果的結論：似乎冥冥中還有一股不可知、不可測的力量，在操控、調理人世間。這種觀念在中國由來已久，至少在戰國時代便出現「五德終始」、「天人感應」一類的論點。高陽花費許多功夫在清史範疇裡，他很不解：為何當時文化相對低落的滿洲人，僅憑藉半部盛行於中下階層社會的《三國演義》，竟然影響了清興明亡。清太宗皇太極熟讀此書以此自矜，舉凡其用兵，自戰略至戰術，以及攏絡駕馭降將的手段，均取法自《三國演義》。這對於擁有大批深厚文化素養的明朝儒將來說，是無論如何不能理解、接受的；又自從文宗咸豐崩逝熱河之後，清朝皇室便苦於子嗣貧乏：如咸豐僅有一子即同治，而同治未及生育即在十九歲時因病早崩。從醇王府抱來的光緒帝載湉，終其三十八年的一生亦多病而未留子嗣，因此才讓慈禧太后有機會翻雲覆雨四十餘年。如果我們順著這個線索往上探討，還可以設想：為何當初咸

²⁰ 同註 3，頁 79。

²¹ 同註 3，頁 303。

²² 同註 3，頁 858。

²³ 同註 3，頁 1043。

豐不將皇位交予恭王，一如宋太祖之傳位於宋太宗，則慈禧無出頭之日；即使咸豐未能一秉大公，仍將皇位傳予其子，為何肅順和恭王這兩位頗為優秀的皇室成員，不能攜手同心共謀國事呢？如果歷史朝此方向進行，慈禧也無出頭一日。

高陽對於清史乃至於人類歷史中不可解、不可究詰的現象和結果，歸之為「氣數」或「天意」，純係個人觀點，未必代表歷史的發展軌跡真有摻入「天」的力量。然而不可否認的，這種認識早已前有所承，在儒家學說裡，皇帝受命於天，皇帝有君臨天下的至高無上的地位，世間沒有可以約束他的力量。但是「天」卻監視警戒著皇帝。董仲舒在完善儒家的國家學說裡，就發展了這套理論。他說「天子受命於天」，²⁴「天」對國君的行為有約束力，並可以通過天象顯示出來。各種災異現象，就是對皇帝做壞事的一種譴告。「國家將有失道之敗，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」。²⁵迨皇帝壞事做絕，則「其惡足以賊害民者，天奪之」。²⁶所以每個王朝的末期，當民怨沸騰之時，便會出現針對王朝的民間輿論，其中有很多就是宣揚當今王朝天命將失、氣數已盡的。這一點，恐怕也是下層儒生如高陽者流的意識。在一個社會裡，當絕大多數的人都感到無法活下去時，那種本於天命的五德終始的改朝換代觀念，便極容易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意識。

高陽將這種意識也帶入《慈禧全傳》的敘事情節裡，而且出現的次數至少高達三十二次。這三十二次分別出現在：《慈禧前傳》頁一〇一、一四九；²⁷《玉座珠簾》頁七一、七二—七三、七五、九三六、九九〇、一〇三二、一〇三九、一〇四〇；²⁸《清宮外史》頁一四八、一四九、一五二、三〇八、三一五—三一六、五八六；²⁹《母子君臣》頁一一一、二七〇、二七六、二八三；³⁰《胭脂井》頁一〇四、五〇二、五一七、六三三；³¹以及《瀛臺落日》的頁一一六、五

²⁴ 見董仲舒：《春秋繁露·順命》（上海市：上海中華書局，出版年不詳）。

²⁵ 見《四史·漢書·董仲舒傳》卷五六。（台灣開明書店，1974年10月台4版發行），頁495—498。

²⁶ 同註24，《春秋繁露·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》。

²⁷ 高陽：《慈禧前傳》（臺北：皇冠出版社，2003年1月22刷）。

²⁸ 同註5。

²⁹ 同註12。

³⁰ 高陽：《母子君臣》（臺北：皇冠出版社，2004年5月初版18刷）。

³¹ 同註13。

0五、五三五、五五二、五七一、六〇八、六〇九和六二二等三十二處。^{3 2}這三十二處的敘事，高陽有時是直接行文中以「氣數」、「天意」等字眼名之，如《慈禧前傳》提到：「這不過是一年間的事，誰想得到這一年的變化是這麼厲害！懿貴妃心想，一年以前，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這麼快成為太后；而居然會有這樣的事！莫非天意？她是永遠朝前看的一個人。既然天意如此，不可辜負。」（頁一四九）

再有一例，是關於同治的不治之症。高陽以太醫群既不能以「梅毒」之症醫治，如若昧著良心當作「天花」又始終醫不好，此時太醫中有人喟嘆道：

李德立不響，過了好久才問：「那要到甚麼時候才會發作？」

「這可不一定，也許幾個月，也許幾年，也許一輩子不發。」

「謝天謝地，但願就此消了下去，一輩子別發吧！」

「就算一輩子不發，將來生的皇子，也會有胎毒。」張本仁黯然嘆息：「我看大清朝的氣數快到了。」（《玉座珠簾》，頁300。）

有時高陽雖不直接以敘述人或人物之口，道出「天意」、「氣數」的字眼，然讀者於行文中一望即知也與其有關：

「內務府的人，也會派上考差，實在有點兒不可思議。」潘祖蔭又說：「今年這一榜不出人才，在三月初六就注定了。」本年會試的考

官是三月初六所放，總裁朱鳳標，副總裁是毛昶熙、皂保，和內閣學士常恩，都不是善於衡文的人；十八房官中，得人望的只有一個御史邊寶泉，霍穆歡以內務府副理事官也能入闈，尤其是怪事。因此這張名單一出來，真才實學之士，先就寒心了……我看了狀頭之作，

空疏之至；探花的原卷也有別字。文運如此，非國家之福。」潘祖蔭大搖其頭。（《玉座珠簾》，頁719）

這段文字出現在此時還是醇王之子載湉滿月，醇王大宴賓客閒聊之時，日後他繼承大統為光緒帝是誰也想不到的事。而高陽於此之際，透過潘祖蔭之口談「載湉滿月適逢國家取士，而所取之士卻皆非真才實學者」，暗示了日後國運必將坎坷，所以說與「氣數」、「天意」亦有關。

另有一例是出現在《清宮外史》。當時清廷才剛將造成政壇「南北大門法」的中俄交涉告一段落，而傳說中慈禧太后「小產」的病體也日有起色，不久又可以恢復「垂簾聽政」之治，朝廷內外似乎頗有一番新氣象。孰料：

天象仍然示警：六月初一夜裡，發現彗星出現在西北；這是人人厭惡的「掃帚星」，而且連朝不絕，初二、初三繼續出現以後，到了六月十二又見，因此震動朝廷。

於是欽天監這個冷衙門，突然「熱」了起來：根據星變占驗，參以史書，說是「主女主出政令」。欽天監是惇王所管，一聽這話，大為皺眉，慈禧太后剛獨專垂簾的時候，說「女主出政令」，不就等於說是「掃帚星主國政」？（《清宮外史》，頁315）

作為一部以人物為主的歷史小說，高陽置入為數如此多的和「氣數」、「天意」直接或間接的敘事情節，這絕非偶然，而是已經成為他對歷史法則的部分體會，所以他才會常常在已知的歷史結果出現之前，預先作此安排。或許高陽諸多關於「氣數」、「天意」之說已脫離理性主義的範疇，它本身不但難以驗證，而且言人人殊各有解讀。但是自從戰國時代以還至董仲舒形成的「天人感應」說，已使得中國知識分子難以單純抱持「道德天」的認識論，因為一旦社稷出現動盪局面，不論是知識分子還是黎民百姓，都會不自覺的從「道德天」滑向「有機自然觀」的天人感應說。所以高陽在《慈禧全傳》裡，正是表現從以倫理道德為中心的思考，滑向對有機自然觀的傾向，從而帶有神秘主義或些許迷信的敘事情節。

高陽在《慈禧全傳》裡，揭櫫了「中心勢力說」和「氣數說」這兩個歷史法則，表面上這兩者互不相干，實則筆者以為兩者有互為因果的關係；「氣數」屬「天」的力量，其中奧妙難知、幽渺不測。但又不盡然如此，因為「中心勢力」是「人」可努力的範圍，君臣如同心朝利益天下蒼生的目標邁進，則「氣數」儘管衰頹凶險，也不是沒有化險為夷、轉禍為福的機會。大清最後五十年間，氣數絕對是衰弱的，否則咸、同、光三帝不會皆體弱多病早崩，甚至極缺乏子嗣血胤，而讓慈禧太后翻騰四十餘載；然而咸豐、同治二帝的身體健康，其實有一部份是人為因素造成的而與天無涉，所以單就「氣數」而論，就不完全是一「天意難回」的無可改變。由於晚清的皇室氣數，導致慈禧冒出頭垂簾聽政，但設若咸豐的遺命中，將恭親王列入顧命大臣名單裡，則奕訢應不至於為了重掌軍機，非發動政變、推翻肅順不可。如此皇權更形鞏固，奕訢和肅順也能繼續重用漢大臣等，則中心勢力便是由相對有為的知識份子所主導，不至於有日後一連串的政爭和派系惡鬥。

因此筆者以為：「氣數」所呈現的跡象，其中恐有部份仍是人可努力轉化的，這部份端賴人的智慧、心性之良窳了。當時儘管肅順等被鬥垮了，但慈禧太后若能一秉大公不私心自用，再有奕訢、文祥、曹毓瑛、曾國藩等內外臣工輔其不足。如此一來，非但政爭惡鬥情形將大為減緩，甚至一些原本有為有能如左宗棠、李鴻章、翁同龢和張佩綸等，也不至為官愈久，面目更形可憎了。可惜慈禧太后的智慧、心性既欠缺復見不及此。基於上述所論，筆者以為「中心勢力說」和「氣數說」兩者並非無涉，而是具有互為因果的關係。

第二節 具現晚清政壇的亂象

從前一節的論述我們得知，高陽觀察到晚清最後五十年間，整體皇室的氣數實在是衰頹而沒有朝氣的。皇族成員雖亟亟乎欲恢復清初八旗勁旅的氣象，無奈英武傑出者寥若晨星，更多的是顛預愚昧之徒，致使慈禧太后私心熾盛，漸失初期秉政之銳意，終於不受清流乃至漢人士大夫的節制。她面對軍機處「南北之爭」的愈演愈烈，不能也不想阻止，更遑論將之統合朝振衰起弊的目標邁進。因為她漸漸意識到一點：手握實權最重要！內外臣工愈是分裂爭鬥，她愈可趁此或扶掖、或打壓，如此她的不合體制之垂簾，將更為鞏固而不可撼動。

正因為當時清朝的氣數已細如游絲，中心勢力又處派系爭權奪利的亂集團，所以導致當時政壇充斥著腐敗、醜陋的現象，遂形成《慈禧全傳》裡，高陽欲呈現的另一個重點——具現晚清政壇的亂象。可以這麼說：如果前一節高陽所揭櫫的歷史法則，是造成晚清政壇亂象的「因」，則本節所探討的便是「果」。所以，高陽在《慈禧全傳》裡的「中心勢力」和「氣數」觀點，正足以闡釋晚清何以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原因。

《慈禧全傳》裡，高陽對於晚清政壇的描述，主要集中在較負面的「為官之道」，以及對種種「腐敗荒唐」現象的嘲諷和揭示這兩方面。原本「為官之道」無所謂好與不好，全繫乎當代的政治風氣，而風氣之厚薄唯繫乎主政之數人而已。如第一節所述，自咸豐崩逝之後，清朝近五十年間的「中心勢力」，幾乎為政爭所籠罩，從上至下呈現的風氣不外乎奪權、搶地盤。因此在朝政江河日下、人心愈加險惡的大環境中，原本應循正當管道而為官、與人交往，便顯得不可行、不合時宜，

從而「為官之道」變得無所不用其極，以致人情世故多是以勢和利的相結，而不問本心、初衷。所以，便很順理成章的往「腐敗」方向發展。

封建官僚機構的腐化，就像鐵在空氣中生鏽、刀在使用中變鈍那樣，是一股不可抗拒的趨勢。為什麼呢？中國封建社會官僚機構具有兩個特徵：第一，為了實現對社會的全面控制，不得不把管理權授給一部分社會成員，這些成員又多來自於封建統治集團。簡言之，中國封建官僚機構是屬於封建統治階層的工具，當上層控制、監督的力量一轉弱（或帶頭腐化），官僚機構的管理權力便乘勢剝削之，正因其屬性如此而決定了腐化的不可避免的趨勢。其次，為了建立龐大的官僚網，又不致於造成國家過重的財政負擔，中央政府對官員採取了兩種看來是互相矛盾的政策，即按官僚等級劃分的特權和普遍的低薪制。正是這兩個特點，使得利用權力謀私利、貪贓枉法、假公濟私、賄賂逢迎、拉關係、說假話、和雙重人格等現象，成為中國官僚體系的通病。上述兩個特點在慈禧垂簾主政的期間，只有更加惡化而已，因為她本身就是個帶頭者；加之清朝中葉以後，外患的賠款和內亂的軍費均極為龐大，嚴重掏空清朝的財政，益發使營私舞弊的情形更加嚴重。

一、為官之道
甲、「先發制人，責人以撇清關係」

咸豐避難至熱河後，於國事種種的煩憂已是有心無力，故而頗縱情聲色之好。肅順一黨特別是怡親王和鄭親王更投其所好，咸豐帝的身子益發如風中之燭，隨時有滅的可能。而一旦皇帝駕崩熱河，恭王、醇王和一班不滿肅黨的朝臣，便會將矛頭指向怡、鄭兩位親王。為了逃避指責，最好的辦法是將責任轉嫁給他人：

（怡親王）載垣慢條斯理地從荷包裡取出一個翡翠鼻煙壺，用小象牙匙舀了兩匙放在手背上，然後用手指沾著送到鼻孔上，使勁地吸了兩吸，才看著他身傍的杜翰說道：「繼園！你問他吧！」

杜翰點點頭，轉臉對樂太用京官以上呼下的通稱說：「樂老爺！王爺有句話要問你，你要老實說，不必忌諱！」

「是！」樂太口裡答應著，心裡在嘀咕；祇怕今天要出紕漏！

要問的話，祇有一句：皇帝的病，到底能好不好？倘不能好，則在世的日子還有幾何？然而就是民間小戶的當家人得了重病，也不能

如此率直發問；何況是萬乘天子？只是措詞過於隱晦含蓄，又怕搔不著癢處，問不出究竟。因此，這位翊戴輔佐有功，被諡為「文正」的杜受田的令子杜翰，此刻頗費沉吟。考慮再三，實在也想不出甚麼婉轉堂皇，不致以辭害義的好說法，祇得一面想，一面緩緩地說：「聖躬違和已久，醫藥調養，都是你一手主持料理。入春以來，京城裡謠言紛傳，私底下在揣測皇上的病勢如何如何！那麼……照你看，到底如何了呢？」³³

從高陽刻意描寫怡親王慢條斯理的吸著鼻煙壺，等過足了癮再擺起王爺的架子，指使杜翰向御醫樂太究責的敘述來看，怡親王顯然不認為自己是造成皇帝病入膏肓的「元凶」之一。樂太一聽到「醫藥調養，都是你一手主持料理」這句話時，大起反感：「大事」未出，責任已定。太醫本來就難當，禍福往往繫於運氣，偏偏皇帝生的是纏綿難治的癆病，不幸遇上就是運氣大壞，再加上怡親王和鄭親王專門逢迎皇上，娛情聲色，運氣更是壞上加壞。更糟的是，皇上不聽醫諫，縱慾自戕，怡鄭兩王不反躬自省，倒要把調養失宜的責任，轉嫁到自己的頭上，任誰也心有不甘。

然而心有不甘又有何用？官場上之所以「官大學問大」，很大的原因在於官大足以「先發制人，責人以撇清關係」，遇到這種官大而不知體恤者，大概只有兩種自處之道：若非「引退」，便是「同流合污」了。

乙、當差技巧

當差辦事照理說應以「德性」「能力」為考量，然而在《慈禧全傳》裡，當差的先就抱持一個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」的心態，然後在「無過」的夾縫中尋隙鑽營。而鑽營就得要先懂得規矩，而規矩又往往因人而異，因此「機靈」「滑頭」和「識相」等就成為當差的技巧了！安德海當的差極多且雜，但他有個萬變不離的宗旨，即一切的所作所為，都要讓懿貴妃知道。安德海這項宗旨純是「因人設事」，因為懿貴妃（即後來的慈禧）不比皇后和麗貴妃，是個精明厲害的角色，為她辦事若有絲毫隱瞞而被發現，肯定是被攆出去，那麼將來可能有的莫大好處就全泡湯了。是故，在還未獲充分信任和授權

之前，一切作為都要讓主子清楚明白，免得引起主子疑忌反而遭禍。

當差的第二個技巧是要「會巴結」。當咸豐帝崩逝，兩宮及幼帝即將回鑾京城，新帝登基的日子必須挑好了以準備典禮。挑日子不就是選擇大吉無沖煞的，怎麼會和「巴結」扯上關係呢？原來，慈禧太后的生日是農曆十月初十，而欽天監挑的新帝登基日雖有三個大吉之日，但居首的正是巧妙的十月初十。她對這天登基滿意極了，還故意裝模作樣的徵詢三位王爺的意見，以示自己能察納諫言，而非獨斷專行者：

惇王再一次表現了他的難得的機警，脫口說道：「甲子日就好。臣看不用挑了，就用第一個。」傳到恭王手裡，一看就明白，欽天監不是已為甚麼人所授意，便是有意巴結；西太后的生日是十月初十，頭一天親生兒子登基，第二天就是聖母皇太后的萬壽，做一個女人，還有比這更得意的事嗎？心裡這麼想，口頭卻不置可否；順手把紅紙遞了給醇王，他看了一下也說：「登基大典以早行為宜。何況十月初九又是大吉的日子！」

等紅紙由雙喜遞回到西太后手裡，她心裡自然高興；但恭王沒有說話，究嫌美中不足，便直接問道：「六爺，你看怎麼著？」恭王早知有此一問，從容答道：「臣在盤算著京裡的情形，看來得及來不及？九月二十三啟駕，總得十月初才能到京，初九行禮，日子是侷促了一點兒，不過趕在聖母皇太后萬壽之前，辦了這件大事也很好。臣回京以後，告訴他們趕緊預備就是了。」³⁴

引文中，不論是欽天監、惇王、醇王還是恭王，全都某種程度的在巴結、討好慈禧太后。所謂「禍禁於未發之時」，慈禧太后的日益專斷獨行、恭王的先盛後衰乃至被罷黜，以及醇王的庸懦無能等現象，全都起於類似這些點點滴滴的巴結和討好有關，以致將慈禧太后給寵壞，助長其缺乏識見卻又擅權的氣焰！

當差的第三個技巧是要「機靈以應變」，為別人止禍往往就是為自己止禍。咸豐帝精於音律，有回召來專司唱戲的昇平署要聽戲，伶工唱著「琵琶記」中的一折「賞秋」。結果當唱到「峭寒生，鴛鴦瓦冷玉壺冰，闌干露溼人猶凭」時，皇帝大為皺眉。責怪教曲的老師陳金崔道：「溼」字是入聲，你怎麼教張多福唱成平聲？難聽死了！

陳金崔囁嚅著回奏：「『溼』字『連腔』，聽起來像平聲。」

「誰叫你『連腔』？」

這一下碰過來，越發叫陳金崔汗流浹背，結結巴巴地說：「是奴才的師父這麼教的。」

他的教曲的師父，如何可用來抵制皇帝？這是極不得體的奏答，可以惹惱了皇帝，有不測之禍。宮中相傳的心法，遇到這種情形，要搶在前面申斥、開脫，來平息皇帝可能會爆發的怒氣。所以安德福福嚴厲地喝道：「好糊塗東西！你師父算得了甚麼？你師父教的，還能比得了萬歲爺的教導！」

「是，是！」陳金崔不住在地下碰著響頭，「奴才糊塗，求萬歲爺教導！」³⁵

當差的第四個技巧是「曲意婉轉」。所謂的「曲意婉轉」，指的是當差的人為了順利完成某項任務，而必須向其交涉的對象，先曲意的站在對方立場設想，再婉轉的曉以利害以說服之。如此，交涉對象容易將當差者視為和自己的立場相一致接受其建議，甚至還會對當差者心存感激之意。《清宮外史》裡有這麼一個例子，光緒帝十四歲萬壽，照例宮裡要傳戲熱鬧一番。唯光緒帝自小因體弱多病，十分怕打雷或鑼鼓聲，因此深以聽戲為苦。他向李蓮英求助，代他向老佛爺回奏：萬壽之日停止唱戲。可是老佛爺平常即愛聽戲，所以名義上雖是為皇帝慶壽傳戲，但誰都知道是老佛爺自己藉機聽戲。當差的李蓮英夾在老佛爺的懿旨和光緒帝的請求之間，兩邊都輕易得罪不得，他該怎麼辦呢？李蓮英的反應極快，他立刻想到一番曲意婉轉的說詞，讓皇帝心甘情愿收回自己的話：

「萬歲爺真正了不得！憂國憂民。老佛爺知道萬歲爺說這話，不知道會多高興。」一頂高帽子將皇帝恭維得十分得意，「那你就快去說吧！」他催促著，「說定了就好降旨。」

「不過，萬歲爺，這裡頭有個斟酌。讓奴才先請問萬歲爺：老佛爺萬壽，該不該唱戲？」

「那自然。你問這話為甚麼？」「自然有個道理。今年是老佛爺五十整壽不是？」

「是啊！這還用你說？」「五十整壽，更該唱戲。如今局勢雖然不好，到了十月裡，一定平定了。那時候萬歲爺一定要盡孝心，替老佛爺熱鬧、熱鬧，是不是呢？」

「當然是。」「這就是了。」李蓮英說：「有道是母慈子孝。到那時候老佛爺想到今年萬歲爺萬壽，沒有唱戲，心裡一定也不願。萬歲爺想想，怎麼個勸法？」³⁶

光緒最後還是心甘情願的准明天唱戲，李蓮英兩邊不得罪，順利交差了事。不論是在宮裡還是任何地方當差，其共同點都是必須面對人，而人是多變、善變的，既然人會變就可以利用某些技巧，讓對方改變心意、立場，方便自己順利達成任務。引文中的李蓮英是務必完成慈禧太后的旨意，因為她才是清朝的實際掌權者；但李蓮英又不是短視近利的尋常太監，光緒以後會如何誰知道呢？或許不久親政後可以真正握有實權也不一定，又何必為此小事得罪小皇帝？所以他先採用嘉許、肯定的言詞讚美皇帝，讓皇帝飄飄然，小皇帝或許心裡以為「知我者乃李諳達也」，這就是「曲意」以奉承；接著很婉轉的向光緒帝曉以利害、陳以人子孝道，一番話將皇帝伺候的服服貼貼，真的讓光緒自己提出唱戲的「旨意」，順利完成太后交待的任務。

丙、揣摩上意須精準

封建專制時代，多數帝王都希望自己的命令，能夠一出宮門便貫徹實施於帝國的海角天涯，這種想法愈是到明、清兩代愈是明顯。此係明、清兩代皇權更集中、相權更薄弱，故而漸漸形成以帝王為中心「一條鞭」式的管理。在此情形下，多少臣工、閹宦等，為取得帝王的好感、重用以遂己利，便會不惜犯禁以交通內、外。然而交通內外畢竟是外在的因素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內在關鍵因素——揣摩上意，這才是能否蒙獲「聖眷」「慈眷」而當紅的最大關鍵。《玉座珠簾》裡，同治帝師李鴻藻因派任「軍機處學習行走」，原職由狀元翁同龢遞任。翁同龢聽得這個消息非常欣慰，這不但證明兩宮太后對他的印象不壞；而且也意味著他接替了李鴻藻遺下的一切差使。當徐桐大學士告知他明天就該他的班「進講」之時，翁同

蘇訝然之餘，開始「揣摩上意」了：他思忖兩宮太后何以如此急迫明天就要進講？莫非是要「面試」？若是面試，則自己有多少學問，是兩宮太后試不出來的。既非測試學問，便是觀察口才和儀節，最重要的是要讓兩宮太后聽得懂、聽得津津有味，同時儀節合宜，那就算圓滿了。³⁷

翁同龢「揣摩上意」的居心是良善的，他為了能順利打響第一炮，通前徹後想過一遍而「揣摩」到任務的重點：兩宮太后讀書不多，斷無法明白自己狀元郎的才學；但口才、儀節和深入淺出的表達，則是一站出去、一開口就高下立見，這才是明天的重點。另有一個例子，則不完全是居心良善，某種程度是為了迎合慈禧太后而如是說：

（欽差大臣兼會辦福建海疆事宜的張佩綸）「是！臣與李鴻章世交。」

「你見了李鴻章，告訴他：朝廷待他不薄。多少人參他，我都壓了下來。他也該激發天良，好好辦事。」慈禧太后又說：「有人罵他是秦檜、賈似道，這話雖然過分，李鴻章也不能沒有警惕。保全和局不是含混了事！」

「是！」張佩綸說：「臣見了李鴻章，一定將皇太后操持的苦心，細細說給他聽。」

「現在國家多事，有好人才一定要讓他出頭。你向來遇事肯留心，可知道有甚麼能幹的人？」

張佩綸已聽說有人保舉江蘇江安糧道張富年、浙江寧紹台道薛福成、安徽徽寧池太廣道張蔭桓，已分飭三省巡撫轉知來京，聽候召見。

張富年他不熟，薛福成和張蔭桓是知道的，都是幹練通達，可辦洋務的人才。但薛福成是慈禧正隆，已調任順天府尹的薛福辰的胞弟，為恐慈禧太后疑心他有意迎合起見，所以只提張蔭桓。³⁸

這段引文透露了兩層為官的技巧：首先，張佩綸於官場的人事異動消息相當靈通，當他得知早已有人推舉洋務人才時，他並不躁進亂表己意，如此方不至於得罪同僚。其次，他在相關人物裡，知悉薛福成和太后有一定的關係，為了怕被疑心有意迎合，所以稍經「揣摩」後僅推舉他最熟、也最無負面影響的張蔭桓。御前奏對推舉人才，不以國家利益為最高考量，唯事事仰承、揣摩慈意，又不敢得罪、唐突同僚。當官至此，算是到了精髓處，但清朝官場的惡化也到極點了。

³⁷ 同註 5，頁 274。

³⁸ 同註 12，頁 540—541。

丁、人情練達、事事謹慎小心

官場爾虞我詐，檯面上是一套，但真正的那一套卻在檯面下。摸不清楚這一點，逢人便說足十分話，很容易「壯志未酬身先死」，所以在官場上行走，務必留心謹慎，以免惹禍上身。《玉座珠簾》裡，同治的師傅兼軍機大臣李鴻藻，因嗣母姚太夫人病歿，照例要報丁憂請開缺。然同治帝最聽李師傅的話，學習情況也最理想。兩宮太后一看見這個摺子，大為著急，便召見恭王和醇王等，商量變通的方法。慈禧太后提議：李鴻藻不必開缺！讓他百日以後，仍舊在書房當差；這一陣子就由倭仁、徐桐和翁同龢三人輪班進講。老學究倭仁奏答：「奏上兩位太后，父母之喪三年；穿孝百日，於禮不合。」雙方有點鬧僵了，但是慈禧又反對不得，因為倭仁所言於禮有據。這時候，資歷最淺的帝師之一翁同龢，則表現出一「謹慎小心」的為官態度。他在跪安退下之後，到李家走了一趟，將召見的情形告訴了李鴻藻，想聽聽看他本人的意見，倘或李的心思略有活動之意，他就犯不著像倭仁那樣固執了。因此，翁同龢先掌握問題的關鍵——當事人的態度，確定之後再決定屆時兩宮問及此事，自己究竟應該持何態度。

翁同龢心裡頗有警惕，此事頗有麻煩，稍一不慎便易得罪人。既然同在弘德殿行走，自然無法脫身事外。他想到李鴻藻以孝母出名，不肯奉詔的決心已很明顯，而兩宮太后挽留的意思又極為殷切，其間如何調停之計？將來不說，照眼前這樣子，恐怕先已就招致了醇王的不滿——慈禧太后命恭王出面，對總司照料皇帝讀書事宜的醇王來說，是件很失面子的事情；倘或遷怒，必是怨到倭仁、徐桐和自己頭上。於是他打定了主意，自己的資望最淺，只要少說話，視倭仁的態度為轉移，便獲咎戾，亦不會太重。³⁹

翁同龢在此事的處理態度，非唯謹慎小心，也兼及一定程度的人情練達：倭仁的反對雖於禮有據，但未能站在兩宮太后和同治帝的立場設想，而將此事擴大成引出了恭王居中斡旋，連帶引起醇王可能不滿的複雜局面。翁同龢為求自保，上述人等一個也得罪不起，是故當他了解李鴻藻的意思後，決定以倭仁的意見為意見，將自己可能的咎戾降到最低。

與此有同功之妙，卻又遠在其上的是袁世凱的例子。《瀛臺落日》裡，當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先後崩逝，隆裕皇太后取代慈禧的位置，宣統帝有其父攝政王載灃輔政，而軍機處三滿兩漢共五人，照說是應以此制正常運作下去才是。然軍機處可能有所變動：因軍機大臣之一張之洞的病勢不輕，可能隨時出缺。攝政王載灃和軍機首輔奕劻，商議如何在漢人中簡拔幹才，以補張之洞的缺。與袁世凱已形成命運共同體的奕劻，為壯大聲勢故而頗提及袁世凱可用。消息很快的傳了出去，載灃有封信託袁世凱的幕僚楊士琦交給袁世凱：

楊士琦立即將載灃的信，雙手奉上，口中說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」袁世凱不作聲，拆開信一看，不過泛泛的慰勉之語，不過確是載灃的親筆；便即問道：「怎麼想起來會給我這麼一信？」

「當然還有話。不過信很重要，有此一信，足以證明，前嫌盡釋。」楊士琦說：「何時出山該考慮了！」……「不行啊！」袁世凱說：「樞庭向來忌滿六人；我去了，總有一個不利。」樞庭忌滿六人的傳說，由來已久；如今是奕劻、鹿傳霖、張之洞、世續、那桐，加上袁世凱便是六個人，『可是，』楊士琦說：「南皮只怕日子不多了。」

「那我更不能去，一去不是妨了南皮。」⁴⁰

袁世凱自從光緒帝崩逝之後一度失勢，並且隆裕皇太后和一班親貴們，視其如寇讎而欲置之死地。如今攝政王有意延攬其入樞，隆裕皇太后也沒有必殺他的理由，為何如此東山再起的良機他卻要放棄呢？這就顯出袁世凱的人情練達和圓融謹慎了：首先，張之洞和自己的交情匪淺，一旦入樞又忌滿六人，則病重的張之洞豈非因我而剋死了？更重要的一點是：自己先前的失勢，正因為根基紮得不够深、權抓得不够大，如今且不忙為出山而出山。袁世凱的想法是，不出則已，一出就需抓大權；在軍機固然仍舊可由「大老」帶頭，但自己需有能夠讓各部院都買帳的實權，在目前來說，起碼像親貴的載澤緊抓著財權，就是件不能容忍的事。⁴¹

袁世凱的這套想法，是受到榮祿當年際遇的啟發。光緒中葉，榮祿受人排擠，後來又得罪了醇王，以至於貶到西安，

坐了好幾年的冷板凳。甲午戰爭之後，恭王復起，正好榮祿到京祝嘏。恭王為保薦榮祿，故意對道賀的賓客說：「我這趟出來，對用人一無成見，只有步軍統領得要我保，我非借重榮仲華不可！」榮祿聽見這話對人說道：「我當初是由尚書降級調用；如果仍照向例，調補侍郎再兼步軍統領，我可不幹。」⁴²結果，榮祿是先補尚書，提督九門。袁世凱對這段往事，想必記憶深刻且甚有領悟，所以當此可入軍機的良機，他掌握的為官之道分寸有二：一、十分謹慎，機會來臨時切莫一頭熱，須審時度勢、顧及人情，否則才剛出山就立刻得罪人。二、當年狼狽出京、面子盡失，如今不僅要能握有實權，而且一出場就得掙回顏面、立穩腳跟，否則將來如何與一班親貴、同僚平起平坐？

不單是《慈禧全傳》呈現的官場文化重視交情，中國歷代以還的官場文化，也多半是「情」重於「理、法」。高陽深諳這種文化特色，所以在《全傳》裡充斥著人際網絡和利害關係的敘事情節。而這種「情」重於「理、法」的文化現象，於官箴的維護是戕害而非保護的力量，因此極易失控而朝顛預、腐敗的方向傾斜。

二、官場的腐敗現象

《全傳》的《瀛臺落日》書名極具象徵意味：清朝至光緒帝和慈禧太后雙雙崩逝之後，舉凡朝政人事的傾軋、帝權的真空、財政的匱乏、貪腐的橫行、民生的凋蔽，和革命的風起雲湧等現象，無不像是落日蕭瑟之景，在在啃噬、吸吮著中國最後皇朝的骨肉、精髓。當宣統繼位，朝廷擬定一系列官制和財政的大改革時，赫然將許多貪贓枉法、胡亂花錢的陳年弊端給揭了出來。就以財政一項而言，度支部擬定原案是各省設清理財政局，由藩司或新設的度支司為總辦，部派監理官二員，監督清理；將預算決算分為三案，光緒三十三年底以前為舊案，宣統三年起為新案，光緒三十四年至宣統二年為現行案。新案、現行案照新章辦理，張之洞和袁世凱二人皆表反對；反對的是這麼一個規定：「各省舊案歷年來未經報部者，分年開列清單，併案銷結。」這就是要算各省的老帳。原來張之洞在湖北二十年，用錢如泥沙，當時督撫中有一「屠錢」之

號，與岑春煊的「屠官」並稱。其中擅自截留，挪挪的公款，不知凡幾。而袁世凱的情形更加嚴重：

至於袁世凱的老帳，如果要算，更是不得了！原來北洋的收支帳目，猶如以前戶部「北檔房」經營國家收支的帳目，無從清算，唯有深諳。早自李鴻章接任直督兼北洋大臣，設立淮軍銀錢收支所開始，便是一筆爛帳；據說李鴻章交卸時，收支所積款數百萬兩之多，袁世凱接手以後，即利用這筆庫存，結交宮闈、朝貴、名士；又據說，接收天津時，洋人亦有上百萬的公款移交，亦為袁世凱揮霍淨盡。楊士驥接袁世凱的手，部中有案的公款虧空到七八百萬之多，無案的更不知凡幾，如何能夠清理？⁴³

按照高陽所敘，舉凡隆裕皇太后、小德張、攝政王載灃、軍機首輔奕劻等，全都拿了袁世凱的好處，可想而知這場改革絕對是以失敗收場的。金觀濤和劉青峰合著的《興盛與危機》，有段話可以說明皇朝官僚體系腐敗現象的原因及發展。該書將中國封建社會劃分政治、經濟和意識型態三個子系統作分析，其中「官僚機構的膨脹和腐化」是政治結構中的主要「無組織力量」。所謂「無組織力量」的定義是：任何組織在自我調節過程中，會不斷產生異化、對原有結構起瓦解作用的力量，那便是「無組織力量」。因此他們提到：「從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結構中無組織力量增長情況來看，我們還可以看到無組織力量增長的兩個特點：一是不可逆性，二是增長到一定程度後就具有的自繁殖性。所謂不可逆性，就是指無組織力量的增長是不可能在這個系統內部，由調節機器自身加以遏制的。雖然任何一架調節機器對它的調節對象是有效的，但對自身的朽壞無能為力。所謂自繁殖性，是指無組織力量的增長，猶如細菌繁殖，當其數量超過一定的臨界點後，就會越繁殖越快，具有惡性加速的機制。」⁴⁴

自從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以迄清亡，所有的貪污、索賄、賣官鬻爵等現象，無不是從宮裡向外輻射至地方州、縣，再從地方州、縣逐級向上「進貢」給宮裡。因此，這股「無組織力量」的細菌數已多到撲殺不盡，因為整個體系已經從樹根到樹梢都爛掉了。所有的作為和改革，最多只是一時的急救，為的是等待對它最後一擊力量的到來而已。筆者整理《慈禧全傳》關於官場腐敗現象的內容，大致可以分為：「敷衍塞責」、「不擇手段」、「昏庸荒唐」和「貪污納賄」四個部分，以下分

⁴³ 同註 15，頁 546。

⁴⁴ 金觀濤、劉青峰合著：《興盛與危機》（臺北：風雲時代出版，1989年二月初版），頁 90—91。

別討論。

甲、敷衍塞責

自從鴉片戰爭之後，清朝飽經內憂外患而疲於奔命。或許是因為事情實在太多、國力實在太弱了，往往面對外國勢力的侵入是戰是和猶豫不決，誰也不敢擔責任。久而久之，卻形成推拖敷衍塞責的腐敗風氣，中法戰爭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。面對洋人，慈禧太后一直有強烈的報復心理。當年英法聯軍內犯，文宗倉皇出狩，為開國以來列祖列宗未曾受過的奇恥大辱；百餘年辛苦經營的圓明園竟燬於一旦，更是令人椎心泣血的莫大恨事。文宗急痛攻心，口吐狂血，不死之病變成不治之疾，種因於此。當時的震動哀痛，她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她總想有朝一日將士效命，能將洋人打敗，才得揚眉吐氣，以告慰文宗在天之靈。

然而軍機處和總理衙門一味求和不欲一戰，其間還請出英、美兩國居間調停。太上軍機醇王向慈禧報告，由美國所提中法和議的意見，一共四條：照天津條約，商定通商辦法；法國軍隊暫駐基隆、淡水；賠償法國兵費五兆法郎，由法國徵收基隆、淡水海關的稅款作抵。以上三條辦到後，中法分別撤兵。慈禧太后一聽完醇王的奏對，勾起了這些日子以來，御前會議關於是戰是和莫衷一是的不滿，醇王此時略作申辯：

「原是各國示好，願意調停，如果一上來就拒人於千里之外，似乎不是敦睦邦交之道。好在權操自我，眼前不妨跟他們敷衍敷衍。」

這一下，越發惹起了慈禧太后蓄積心頭已久的不滿與牢騷，「辦洋務就懂得敷衍。從咸豐末年，設立總理衙門以來，一直就講的是敷衍！」

她激動地說：「敷衍了快三十年了，哪一國也沒有敷衍好。」接著，話題一轉，告誡醇王，譏刺恭王：「論敷衍的本事，你比人家差得遠！

我要願意敷衍，又何必讓你來管事？不會找會敷衍的人？」⁴⁵

慈禧太后一味主戰或許近於蠻幹，但是她責備醇王乃至於恭王的一番話，又何嘗不是「自強運動」三十年來的真實寫照：一味在表面上下功夫，臨事卻又推說船不堅、砲不利，無法一戰！如果連當時皇室親貴中堪稱優秀的恭王，在辦理洋務、

軍務的態度上，都是一意敷衍塞責，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話，其它部院乃至督撫州縣等風氣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另外一個例子，則表現出「推諉塞責」的腐敗現象。出身翰林，擁有上摺言事權的「翰林四諫」之一的張佩綸，在朝廷對法國是戰是和莫衷一是之時，一意主戰大言誇誇的批評主和派「庸懦無能、畏首畏尾」，讓慈禧太后對他深表激賞，故而授以「欽差大臣」身分，會辦東南海疆事務。一時之間，主戰派佔盡上風，對法作戰便看張佩綸大顯神通了。

然而到了福建之後，張佩綸以欽差身分到處頤指氣使，搞得「政不通、人不和」，督撫等大小官員全受他的氣而敢怒不敢言。另外，該備戰、該情蒐的也做不全，竟然天真的相信有世交之誼李鴻章的看法而改變立場：李鴻章主張極力保和局，李也自許為寇準，相信法國會如同遼國一般，有自動請和的「澶淵之盟」。因為相信李鴻章，所以張佩綸也深信此仗打不起來。高陽戲謔嘲諷張佩綸此時的心境：

史家有定評，澶淵之盟之能夠成功，全靠寇準的鎮靜，使得遼國莫測虛實。既然照此路子走，當然也要學寇準的樣，不是「斫鱸酣飲」；就是帳中高臥，無視於窺伺的強敵。

而這一夜也正是睡覺的天氣，大雨大風，一洗炎暑，雖無「冰肌玉骨」，卻自「清涼無汗」。他躺在鋪了龍鬚草蓆的涼床上，手把一卷《世說新語》，遙想著晉人的風流；無奈驚濤拍岸，不時夾雜著窮吼極叫的汽笛聲，實在有些靜不下心來。⁴⁶

局勢的發展完全超乎張佩綸的想像。一仗打下來，馬尾的水師艦艇幾乎覆滅殆盡，欽差和巡撫早就落荒而逃，任令法軍肆虐，地方一片混亂。高陽顯然對於張佩綸者流極為沉痛、不滿，故而在小說裡，不惜將張佩綸事後「推諉塞責」的奏摺幾乎全文抄錄，其間每一段奏摺原文之後，即附加個人的意見和批評，顯示高陽對張佩綸者流的痛心與不屑。他之於清朝，懷有家族先輩炳耀歷史的孺慕之情。而晚清的日益衰敗，和許多像張佩綸般士大夫的大言夸夸、重利輕義、遇事退縮、仰承上意等大有關係，故而藉這道奏摺，抒發其恨鐵不成鋼的情緒。今舉其要者以為說明：

「初一、二日大雨如注，風勢猛烈；初二子夜、初三黎明，臣屢以手書飭諸管駕，相機合力，有『初三風定，法必妄動』之語；比潮平，

而法人炮聲作矣！臣一面飭陸軍整隊，並以小炮登山，與水師相應；一面升山巔觀戰。」

這一段是昧著良心說話；他根本未曾「升山巔觀戰」，所以所敘的戰況，多為耳食之言。而既升山巔，又如何下了山，就不交代了。在說明損失以後，緊接著便抒感想：

「此次法人譎詐百出，和戰無常，彼可橫行，我多顧慮；彼能約從，我少近援。一月之久，彼稔知我疆吏吟域，士卒孤疲；復乘雨後潮急，彼船得勢，違例猝發，天實為之，謂之何哉？」

這是表示形格勢禁，既非朝廷調度無方，亦非將士不能用命，從上到下，沒有人該負戰敗的責任，當然他亦不任咎戾。但這層意思，只能暗在內；在表面上，他必須自陳無狀。⁴⁷

所謂「書生誤國」，又此一例！未出京時自以為管仲、樂毅，一到該管地則處處擺足官威，於天時、地利、人和三者皆失。堂堂兩榜出身進而翰林的欽差大臣，於戰敗之後不知反省、檢討，卻將大好的筆墨之才，耗費在「推諉塞責、搽脂抹粉」的無用奏摺之上，官場的腐敗可見一斑了。

乙、不擇手段

自從同治皇后阿魯特氏殉節自殺之後，其父蒙古狀元崇綺便遭慈禧太后冷落，以致閒散了好些年，功名心盛的他一直想復起。《胭脂井》裡，時值「戊戌政變」失敗未久，守舊勢力試圖反撲，亟欲說動慈禧太后以策動廢掉光緒帝，老派則以三朝元老的徐桐為首。一日兩人碰頭，徐桐對崇綺轉述太后頗有意廢掉光緒，為了在朝廷內外營造光緒該當廢掉的氣氛，徐桐旁敲側擊地暗示崇綺是最好的言論製造者。

徐桐究竟是理學出身，所以臉皮較之肅順、載垣和端華等「三凶」，畢竟不可同日而語。為了觸及「廢立」這麼大不敬的敏感問題，徐桐還先假意喝酒配菜，一副意態悠閒，像是在聊家常似的問崇綺，可知太后心裡攔著一樁難言之事？徐桐見崇綺的好奇心被引發了，再進一步的問：「皇上至今無子，往後恐怕更沒有希望了！萬一有個三長兩短，怎麼辦？」崇綺

立刻想到廿四年前皇帝女婿早崩，愛女繼之被逼殉節的往事，不免悲從中來。徐桐見時機成熟，該是下猛藥的時候了，終於將「借刀殺人」之計說出：

「於其樞前定策，勿遽之間迎外藩入承大統。無如早早——」徐桐吃力地吐出兩個字：「廢立！」

臣下談廢立，是十惡不赦的第一款大罪。雖明知不礙，心頭仍舊一震。崇綺定定神說：「這，何不斷然下懿旨？能立就能廢！」

「話是不錯。但總得有個人發動。」徐桐略略放低了聲音，「文山，你別忘了，你跟別人的身分不同。」

這下才提醒了崇綺，自己是椒房貴戚。而廢立是國事，也是家事，親戚可以說話的……

「我明白了，今上如果無子，就不配做皇帝。可是，」崇綺忽又困惑，「這話只要敢說，人人都可以說！」「對！不過，由你來說最適宜。為甚麼呢？因為皇上無子，不就耽誤了你的外孫了嗎？」

「啊，啊！原來有這麼一層道理在內。」崇綺精神抖擻地說：「不錯，不錯！這有關國本的大計，我可以發生一點兒的作用。」⁴⁸

這番對話至少顯現了慈禧太后、老派和崇綺三方的「不擇手段」。真正主謀者是慈禧太后，她自己隱身幕後不出面，假意對徐桐示好，言談間頗談及皇上的病情極不樂觀，徐桐只要不是笨蛋，稍加揣摩即知太后的心意；而徐桐雖處事迂腐卻也不簡單，怎可自失身分到處放空氣？剛好眼前有個失意的先帝國丈可資利用，因此一樁不擇手段的廢立計劃於焉展開。為何說是「不擇手段」呢？原因在於光緒帝雖然身子不好，也還不到「大漸」、「駕崩」的程度，其間慈禧太后令人對光緒下藥，使其病情加重、始終不癒；再加上四處放風聲說皇帝病情已是如何嚴重，種種不擇手段無非欲廢立光緒，以鞏固慈禧及一班守舊派的權力而已。

丙、喪盡天良

《胭脂井》裡拳匪橫行，加之有親貴及封疆大吏信之不疑，一時之間義和團聲勢浩大。一次在宮裡頭，預備光緒帝駕

崩後繼位的大阿哥溥儀，竟扮成拳匪的「二師兄」裝束，手持鋼叉與小太監在開打，正巧為慈禧太后撞見了，勃然大怒狠罵了一頓。慈禧太后眼看不開的不像話了，但又不確定義和團究竟不可用，故而決定派向來以理路清晰的軍機大臣趙舒翹前去考察實情。臨行前，軍機首輔榮祿特意找來趙舒翹叮嚀一番，趙舒翹終於明白自己此行的真正任務：「並非去安撫或者解散義和團，亦不須負任何處理善後之責，純粹是作太后的耳目以了解實情回奏。」

照理說趙舒翹的任務並不困難，只要將所見所聞據實回報即可，孰料到了涿州全變了樣。義和團師兄們以龐大聲勢，要求趙舒翹稟奏朝廷：將與義和團為敵的聶士成革職，否則後果自負！當此之際，趙舒翹還挺得住，尚欲就眼前敷衍這批亂民，再借重聶士成之手鎮壓涿州的義和團。誰知朝廷昏庸至極，就在這當兒，趙舒翹接到一道上諭，大意是：「責備聶士成不應擅自攻打義和團，倘或因此激出變故，唯聶士成是問。」這下子，趙舒翹想借重聶士成的計劃落空了，他即刻束裝回京，路上籌思：如不肯遷就宮裡頭支持義和團者，甚至與義和團作對，下場就和聶士成等人一樣，還不如辭官罷了！轉念一想：「一品官兒，又是宰相之位的軍機大臣。幾人能到此地位？加之老母在堂……。」⁴⁹

為了保住得來不易的「一品」軍機大臣之位，當慈禧太后召見，問他若義和團鬧起來，會不會搞得不可收拾時，他只是含糊的回答：「不要緊」。⁵⁰「不要緊」三字，在趙舒翹是含糊其詞；而在慈禧太后聽來卻是要言不煩，強化了她的決定：「四十年臨朝聽政，慈禧太后自信甚麼人都能駕馭，甚麼事都能操縱；唯獨怕義和團蠢和鹿豕，本事再大，總不能讓野獸乖乖聽命。到亂子鬧大了，狼奔豕突，不受羈勒，如何得了？既然『不要緊』，就讓他們鬧一鬧；教洋人知道民氣方張，不可輕侮，要想在中國傳教做買賣，非請朝廷保護不可。那一來不管廢立也好，建儲也好，各國公使就不敢來多管閒事了！」⁵¹全都為了一己私利而喪盡天良，將國家命運及千萬人的性命全給斷送了。

「喪盡天良」之事更有一樁，當拳匪越鬧越失控時，慈禧太后漸漸改變態度，準備拿支持義和團的親貴開刀，第一步

⁴⁹ 同註 13，頁 297。

⁵⁰ 同註 13，頁 298。

⁵¹ 同註 50。

便是廢掉大阿哥溥儀。先時因子（溥儀）而貴的載漪等人，感到自身處境的危機已浮現，剎時間許多親貴宗藩受慈禧太后荼毒的前塵往事一起湧現。因此，載漪等人竟打算痛痛快快的大幹一場，即利用義和團師兄們硬闖禁宮，意圖「擄走光緒、伺機殺掉慈禧太后」。這批以載漪為首的少年親貴們，手段之粗糙、毒辣，臨事時卻又虎頭蛇尾、缺乏謀略，以致兩項「喪盡天良」的計劃全數落空，最後換得的不過是「自盡」或「發配邊疆，永遠圈禁」的下場。

丁、貪污納賄

《慈禧全傳》裡最腐敗的現象便是「貪污索賄」。貪污索賄的金額可以從幾十兩到上千萬兩銀子之多，而索賄的對象可以上自皇帝、王公大臣，下自州府知縣，當然這一切全來自於民脂民膏。舉例來說，光緒帝幾乎每回向慈禧請安，就得給太監五十兩銀，內務府及太監連皇帝都不放過，其餘王公大臣晉見老佛爺所給的「門包」金額就可想而知了。還有，平亂有功且自視甚高的左宗棠入覲面聖，奏對完後將頂戴給忘在養心殿上。慈安太后命安德海將頂戴送還給左宗棠，結果竟為此花了三千兩銀子「贖回」頂戴，太監的囂張跋扈可見一斑。⁵²所以，當崇綺嫁女兒為同治后，以及慈禧親弟弟桂祥嫁女兒為光緒后，都為內務府和太監們刮了不少的紅包，也就不足為奇了。然而這一切，有很大的原因是慈禧太后所縱容出來的，而幫兇則是所有統治階層如恭王、醇王、李鴻章、榮祿、奕劻、袁世凱等。

《全傳》裡關於貪污的敘事情節相當多，金額最大、影響極深遠的，非曾氏兄弟打下太平天國的「金陵大捷」莫屬了。十四年的太平天國之亂，橫掃清朝半壁江山，朝廷花在軍費上難以數計。眼看大功即將告成，恭王正為戰後如何報銷這筆軍費而發愁，所有指望全寄託在天王府傳說中如海的金銀以此充抵。孰料，曾國藩一道奏摺，將此希望給淹滅了：

歷年以來，中外紛傳，逆賊之富，金銀如海，乃克復老巢，而全無貨財，實出預計之外。目下籌辦善後事宜，需銀甚急，為款甚鉅，如撫卹災民，修理城垣駐防滿營，皆善後之大端。其餘百緒繁興，左支右絀，欣喜之餘，翻增焦灼。⁵³

⁵² 同註 5，頁 491。

⁵³ 同註 5，頁 22。

當時幾乎所有人都相信一種說法：天王府的確有歷年搜刮自各地的金銀財寶，然而當曾國荃所部攻進天王府後，將所有資財劫掠一空，隨即一把火將天王府給燒的乾乾淨淨。而由於曾國藩一直很疼這位九弟，加之百戰功高又無證據，諒朝廷也不會追究過甚，所以干冒指責為弟圓謊。試想：曾國荃所貪不只天王府可觀的資財，尚有打仗十餘年來四處搜刮及剋扣的軍餉等，這兩項一加總，其貪污金額之高絕對令人瞠目結舌。

此外，張之洞督湖廣二十年，花錢如泥沙，時人稱其為「屠錢」；恭親王權傾朝野時，凡有事到恭王府的，多半先得在門房處送個「門包」算是掛號，否則絕難見到恭王；京官向來極窮，每每要靠各省入京覲見、辦事官員的「炭敬」和「冰敬」接濟，否則償還不了如山的債務。也因此，京裡的翰林、清流御史們，有時為了過日子，就必須充當打手，收錢上摺言參他人，致使清流漸趨下流。

當一國之「柏臺」——御史都汲汲營營於財貨，進而淪為政爭的工具、打手，那表示政治體系中的「無組織力量」的細菌數已達到飽和狀態，從而顯示該王朝的腐敗現象也正處於高峰！

本章小結

由於高陽的多輩先祖曾在清代仕宦，曾經風光的家族輝煌歲月，對照自己雖已是成名作家，終究還是流落於民間，無由登廟堂之階以實現安邦定國的一介白衣。高陽藉「著書立說」而揚名天下，就知名度而言的確實現了早年許下的「長大後要比許家所有的人出名」的誓言，但是他始終以無緣用於世而牢騷滿腹。既然於仕途已無望，更別提在成就上接續甚至超邁先祖輩了，於是形成了高陽既自負才華又頗愧對先祖的複雜情愫，並以此情愫審視晚清政壇的諸多亂象。《慈禧全傳》這部作品記述的年代，正是清代氣數最衰頹、中心勢力不斷為派系政爭所苦最為嚴重之時。皇室成員中夠份量的，像是肅順、恭親王、醇親王、慶親王和小醇王等，全都不是慈禧太后的對手，不是身首異處、黯然下野，便是希旨容媚、唯事仰承；軍機處的「南北之爭」和清流的唯務攻擊，正好讓慈禧拿來作為制衡、裁抑的工具；而地方上的督撫州縣，也多為了升官發財而不肯實心實力的辦事。以高陽多年治史、讀史的心得，他得到了兩個歷史法則，即「中心勢力說」和「氣數說」。

，並以此審視晚清的宮廷和政壇的變化。《慈禧全傳》中，高陽透過三個時期政爭的鋪陳，點出這便是當時的「中心勢力」。一旦中心勢力的焦點不務利益天下蒼生，而唯打垮異己、私心自用的話，則國運之「一氣數」當然也就每況愈下了。乃至於「中心勢力」和「一氣數」兩者互為因果影響，整個上層統治集團愈來愈容不下思慮清楚、有為有守之士，大清的中下層社會如同壓力鍋般，不滿的情緒日漸高張，滅亡已是指日可待之事。所以，整個晚清五十年，從宮廷到地方，全無視外敵之侵奪覬覦和人民的水深火熱，仍汲汲營營於一己之名位與利祿。這對照高陽和清代的感情來說是沉痛、恨鐵不成鋼的，但他的表達方式有別於晚清「譴責小說」的溢惡和嚴譴指責，多是透過細膩的狀態或略帶嘲諷的筆調，卻能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，產生悲憤或嘆息的情緒。

而在政壇一片的黑暗亂象中，終究有數點明星孤單的閃爍著，他們是中下層官僚群的良心，儘管星光微弱無力改變局面，但高陽發現了，也不忘記為他們記上一筆以作表彰。《玉座珠簾》裡，奉旨欽差巡視五千里長江水師的彭玉麟，共參劾了兩百八十餘位大小官員，所請治罪不論輕重皆照准，⁵⁴同時還親自將一位為害地方的七品武官張虎山給治了死罪，⁵⁵而堂堂的巡江欽差大臣彭玉麟，不但穿著像個土老頭子，隨從也有一位奚僮和兩名的親兵。《清宮外史》裡，閻敬銘督辦山西賑務真正做到涓滴歸公，老百姓拿他比做包龍圖；而在湖北任藩司時，為除掉姦殺民女的總督官文的「變童」張玉，不惜以打地鋪的方式，非逼得裝病不見的官文露臉處理不可，官文終究為閻敬銘的正氣與蠻性所屈服，將張玉給辦了。⁵⁶而《母子君臣》中，曾計殺權閹安德海的山東巡撫丁寶楨，後來升任四川總督，他也是一清如水的好官。他當四川總督時，只取核定的養廉銀，至於夔州關的公費每年一萬三千兩、川鹽局的公費每年三萬兩皆一概不取。然其所得養廉銀既要支付幕僚薪資、分潤親友故舊，剩下的常不夠生活，每每硬著頭皮上當舖以救急。⁵⁷

⁵⁴ 同註 5，頁 774。

⁵⁵ 同註 5，頁 778—792。

⁵⁶ 同註 12，頁 131—135。

⁵⁷ 同註 30，頁 59。

相較於倭仁、徐桐的食古不化、滿口程朱理學；翁同龢、張佩綸的唯務空談、書生誤國，以及左宗棠的高傲凌人、英雄欺世；以李鴻章為首的淮軍將領多功名心盛等士大夫而論，彭、閻、丁三人可謂是《慈禧全傳》中，堪稱「典範夙昔」的氣節人物。慈禧太后和恭親王初期也曾支持過他們，惜未能一本初衷，很快的為權柄和物慾所腐化，致使國力如飛瀑般傾瀉直下。由於這三位真正為國為民、實心實力辦事的好官，在《慈禧全傳》中佔的篇幅過少，不易歸為一類詳加探討，故筆者將之置入本章「小結」，不但是作為補充說明，更可與「一節所論作一簡單對照」。